



伊沙访谈录（1993—2017）

伊沙 著

WOZAIWOSHUO

 青海人民出版社

我在这里
WOZAIWOSHUO

伊沙诗选（1993-2017）

伊沙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我在我说话：伊沙访谈录：1993—2017 / 伊沙著. --
西宁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，2017.9
ISBN 978-7-225-05414-8

I . ①我… II . ①伊… III . ①访问记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 . ① 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49807 号

我在我说话

——伊沙访谈录：1993—2017

伊 沙 著

出 版 人 樊原成

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西宁市五四西路 71 号 邮政编码：810023 电话：（0971）6143426（总编室）

发 行 热 线 （0971）6143516 / 6137730

网 址 <http://www.qhrmcbs.com>

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90 mm × 1240 mm 1/32

印 张 14.875

字 数 500 千

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5-05414-8

定 价 4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自序

这是一本计划外的书。

它甚至不是来自写作。

但又确实是来自写作。

1993年，我27岁，接受了平生第一次专访，来自诗人李岩，他是为《创世纪》杂志做的，后来终未刊出，转而发表在《诗参考》上。这一次诗歌专业性的访谈，采用的是笔答的形式。

从那时至今，转眼24年过去了，粗略算来，我接受过上百家媒体及个人的访谈，采用的形式多种多样：有见面采访的，有电话采访的，有访完不经我看便见报的，有访完经我修订见报的，还有直接采用笔问笔答的……此时此刻，我要感谢我自己，在有可能选择采访形式的时候，没有偷懒，十分尽责，尽量采用笔答的形式，构成了本书的物质基础，本书正是从中精选出来的，其他采访形式做

得再好，也不在被选之列。

所以说，本书还是来自于写作。

只不过，它每一章节所涉及的话题，均来自于他人的灵感。这么说吧，这是他人为我罗列提纲与结构，我自己来书写完成的一部书。

时代的预言家们怎么也预见不到：网络时代，访谈的形式开始风行，尤其是在专业内部，这大大提高了访谈录的含金量，令其作为一种写作形式而独立存在。如此说来，我这部书也是顺应时代的产物。

在过去的 24 年中，我是在哪个时间点上意识到了它有必要作为一部书而存在呢？我的诗做了最好的纪录：

梦 90

一个念头

撑起一个梦：

“如果有机会

一定要把我的访谈录

集成一本书

一准儿是本好书！”

醒来瞧见

床头柜上放着一本《边缘诗刊》

其中头条正是我的一篇访谈录

冬日午后暖暖的阳光
从未拉窗帘的窗上照进来
照着它也照着我
我没有马上起床
回味午觉前的例行阅读
那一次心潮澎湃的自读

本诗写于 2010 年，记录了冬日午觉中所做的一个梦，我梦见了这本书……这确乎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它的价值所在，但也没有主动去寻求出版，关系很近的朋友知道：在写作之外，我其实是一个被动人，打那以后，我似乎一直在等待着、在等待中继续积累着……7 年过去了，机会终于出现，应了那句老话：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！

至于这是不是一本好书，我说了不算，读者说了才算。
但请允许我固执地坚信：让我心潮澎湃的，必在你们心湖之上
溅起涟漪……

伊沙

2017.6.18 长安

目录 CONTENTS

- 我是我自个儿的爹 ——《创世纪》杂志访谈录 /1
伊沙：我整明白了吗？——《葵》诗刊访谈录 /4
我在我所说的——《锋刃》诗刊访谈录 /13
出访瑞典归来——《财经时报》访谈录 /22
这诗，这人，这坛子——与赵丽华对话 /27
从写作到生活——《甲壳虫》杂志访谈录 /47
“甲申风暴·21世纪诗歌大展”诗人专访·伊沙篇
——《南方都市报》访谈录 /58
“我是为全集写作的作家”——“诗生活”网站访谈录 /66
大陆醒来了——《明天》诗刊访谈录 /79
我做专栏作家——《精品购物指南》访谈录 /90
把文学还给读者？——与赵凝对话录 /94
“我看我最像”——《中国诗人》诗刊访谈录 /103
“我会盯住眼下的每一天”
——中间代诗人访谈系列之伊沙篇 /120
懒得说——新世代六诗人访谈之伊沙篇 /126

目录 CONTENTS

“我心不俗” /131
仍然是“一个都不放过”——《狂欢》访谈录 /137
我将听从中年的召唤——《美图生活》杂志访谈录 /156
从《狂欢》说起——《北京青年周刊》访谈录 /162
没有文坛，唯有文学——《重庆商报》访谈录 /171
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——《岳麓晨报》访谈录 /176
诗无探索的意味就等于失去了生命——《新诗大观》访谈录 /181
我奔着我所理解的“伟大”而去
——《乌鲁木齐晚报》访谈录 /185
文学十年，语言的狂欢——与赵凝对话录 /190
善待自己的那颗心和那支笔吧——《中国诗歌调查》答问录 /199
中国没有摇滚，只有下贱的娱乐——某音乐杂志访谈录 /203
关于“庸诗榜”——《诗生活》访谈录 /209
作为异端而存在——《竞报》访谈录 /228
我的文学永远关乎人生——《都市快报》访谈录 /232
诗人震醒了？——《河北青年报》访谈录 /237

目录 CONTENTS

从洛特雷阿蒙说起——向征现场访谈录	/240
天才之言——英国《诗报》访谈录	/246
是我的诗让我站在了浪尖上	
——张后“访谈诗人中国”系列之一	/252
从大问题到小问题	
——马陌上“十大文化人物”访谈录之伊沙篇	/272
写作对教学有帮助——《新商报》访谈录	/301
我心中永远的长安——“我爱我的城市”专题访谈录	/306
话说新世纪诗歌——《诗探索》访谈录	/315
“有多大的责难您都能面对”——《现代生活报》访谈录	/319
南岳话诗——《湘潭报》访谈录	/334
《蓝灯》之光——2010：冬天的对话	/340
“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祖先的血液”	
——《当代诗人》访谈录	/367
冠军伊沙——《贵州民族报》访谈录	/375
回答学生——西外《文苑》访谈录	/380

目录 CONTENTS

关于《新世纪诗典》

——《贵州民族报·文学周刊》高端访谈之伊沙 /390

天机不可泄露

——《中国诗歌》月刊“当代名家访谈录”栏目访谈录 /397

从《新世纪诗典》谈起

——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报文化周刊专访 /403

《中国诗歌地理(陕西篇)》伊沙访谈 /405

静如处子，动若脱兔——答刘涛问 /412

一沙一世界 /418

面对面——澳大利亚网站访谈录 /428

十问题——巴西诗歌与批评杂志《sibila》访谈录 /431

我永远有“做到”的目标而无“得到”的目标

——《延河》下半月刊访谈录 /434

面对诗国的发问——答俄罗斯学者、翻译家邓月娘女士 /442

知天命否——《芳草》杂志访谈录 /444

我是我自个儿的爹

——《创世纪》杂志访谈录

李岩：伊沙，你是在“第三代”诗歌精神和艺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。拿你自己的话说：你曾吃过“第三代”的“奶”。但在我们最近以来的多次谈话中，你对他们颇多非议，大有不认“奶娘”之势，记得你在《野种之歌》里写过“十三岁我抬着花轿/把母亲远嫁”——这是否也可以看成是你现在对“第三代”的态度？

伊沙：“第三代”如何，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。自1986年开始他们一直是诗坛的中坚力量，人们一直期待他们再次超越。这种期待已经够久了。他们之所以给人仍然“健在”的感觉是因为下一代人太差了，根本没法“取代”他们。另外，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惯性，我们现在谈论的“新鲜话题”往往是几年前的事情，我们现在谈论的“第三代”更多是指他们几年前的成就。至少我是有点儿不耐烦了。

李岩：你自诩为“艺术世界的杂种”，并直言宣称：“我是我自个儿的爹！”如今，后现代主义艺术已成为一种新时尚。人人都想着往自个儿的脸上贴点儿“金”。很多人认为你也是后现代诗人，你说呢？而在日常生活中你差不多完全是个循规蹈矩的人，衣冠齐整、按时上下班、家庭观念很重、没一点艺术家的派头……

伊沙：我可能更愿意做一个后现代主义写作者，而非生活行为外观上的“后现代主义者”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究竟能够实现什么？我能循规蹈矩到哪儿去？我不循规蹈矩又能到哪儿去？写作就是为了实现我们在生活中无法实现的那部分东西——这是我对写作的一个基本认识。后现代主要是精神而非单纯的写作技巧，主要是你作为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所持有的态度。成为后现代主义写作者，并不是目的，而是开始，我的理解是你进不了后现代，就意味着进入不了当代。

李岩：在我们私下交谈中，你常提到两个名字：北岛和崔健，特别是后者，他们对你的影响很大吗？

伊沙：我喜欢他们。不论你“第三代”怎样在潮流上“超越”了北岛，都没用，北岛已经完成了，而“第三代”——即使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好像都患了“早泄”。崔健其实是中国最棒的诗人，看他的歌词我们这些专门弄诗的都该感到脸红！跟崔健一比，多少诗人都成了屎了！将来真正的诗歌史，肯定有崔健一章。一位朋友对我说：老崔如果看了你的诗，会喜欢的！这令我足足兴奋了一天。北岛和崔健都达到了中国人在艺术领域目前能够达到的最佳水平。

李岩：一家刊物发表了你的诗《和日本妞亲热》，编辑部找你的电话不断，且多为青年女性，很开心吧？我还听说一些从不读诗的城市青年把你的诗写在T恤衫上招摇过市或用复印机放大后贴在墙上每日早起必读……这令人联想到汪国真，还有王朔，你会不会也像我们一样成为“午餐半小时”式的消费作家呢？

伊沙：我的诗可能具有某种潜在的“商业价值”，有些读者一看题目就想往下看，如果这些东西能畅销，我将不拒绝任何销路。只有不畅销的作家才反对畅销。但若把我和汪国真扯在一起，我会认

为这是在骂我！崔健畅销，蔡国庆也畅销，这是一码事吗？王朔身上有某些好的因素，但这小子太“聪明”，这种“聪明”坏事，王朔现在是一种“高级媚俗”。我不拒绝“人民”，既然有人已把我的诗和“后现代主义”扯在一起，而“后现代”多多少少与商业社会脱不了干系，所以我不回避这个问题。

李岩：你确实很有底气，因而我相信你的狂妄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。最后，我要向你提出这样的问题：作为新锐诗人，你这么年轻，你会给诗歌、给这个时代带来什么？

伊沙：“伊沙给你刺激！”——这是我想对我的读者所讲的。至于……能带来什么，我没想过，也不愿意去想——累！

(1993年)

伊沙：我整明白了吗？

——《葵》诗刊访谈录

问：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？请描述当时的景况。

答：1983年。我读高一。我的同学姜雁飞在《语文报》上发表了一首小诗，在全年级引起小小的轰动。因为一块参加市里的一项征文活动，我和他有过几次接触，他总是在谈诗，并借给我看一些诗选和诗刊。那年我写下了我的第一首诗，共有13行，后来发表在《陕西日报》上，成了我的“处女作”。接到这份报纸的那天晚上，我久久难眠，想得很多……误入歧途就是这样开始的。

问：你怎样看待“诗歌生成的奇迹”？

答：我体会到这种“奇迹”的存在，但我怀疑它是否像有些人宣扬得那么玄乎。我也无法抛开汉语诗歌的具体环境来谈论它，汉语本身大概就是“奇迹”丛生的。汉语诗人是世界上最懒最容易当的诗人，蒙骗者众。汉语是这样一种语言：锈迹斑斑可视为色彩斑斓，独有的象形文字本身就是诗意的，是“生成的奇迹”。“玫瑰”是一个词，但在汉语中它是乌七八糟的，绝大多数汉语诗人就是利用这种幻象的骗子，某些所谓的“优秀诗人”不过是骗术更高而已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“诗歌生成的奇迹”、“语言的炼金术士”都是可疑的。相反，

我更赞同于坚的提法：操作。对操作的强调可使一些人走出骗局。

问：就你的观点来看，诗应是抒情的，还是反抒情的？

答：我可否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提出一点异议？诗与“抒情”二字的关系纠缠得就那么紧吗？就像说起当代汉诗，似乎离不开可恶的“朦胧”（从“朦胧”到“后朦胧”）二字。遵从字面的限定，我的观点是：诗曾经是抒情的，如今是反抒情——但要丰富得多。

问：诗人是否必须具备幽默的品质？

答：这是必须具备的。缺乏这种品质的诗人迟早要被淘汰。缺乏这种品质的诗人面临着技术的限定，只能一味抒情，或到陈述为止，反讽、戏拟……这些东西限定了他，成为瘸腿的，根本上说就是完全瘫痪的人，在今天那些满目忧伤的单纯歌者恐怕已是自成幽默。缺乏幽默品质的读者同样是可怕的，我的《电脑》一诗发表后，江西一位读者写道：“被加速的时代拉下一段距离，是一群据说才情非凡的现代诗人，他们气喘吁吁地追赶，有人掉队，有人改弦更张，还有位叫伊沙的，骂了一句脏话，读者的减少使诗人们感到恐慌，但这样的读者你需要吗？中国文化视幽默为‘小’，中国人以欠缺这种品质为正常，而与创造者的心性、视角和对诗的发现有关，中国绝大部分诗人缺乏这种品质：一大堆不苟言笑、酸气乱冒的‘抒情机器’。”

问：到目前为止，你的写作经历过哪几个阶段？

答：1983—1988年的五年间应该算我的第一阶段，是凭着爱好和兴趣，学习与模仿的时期，写作也是缺乏连续性的，兴致来了，写上几首。对诗的认识也是模糊而零乱的，是经常被人开眼的时期，我写过多种路子的东西：先是思想火花式的小诗，然后是细腻柔美无病呻吟的，最后是意象叠加的英雄主义宣言。1988年至今是我经历过的第二阶段，也是我创作的真正开始，我开始用口语写诗，并

在此后的 8 年中走出自己的路子，渐渐形成一种个人风格。这 8 年写下的东西基本上已体现在诗集《饿死诗人》《一行乘三》(合著)及长诗《史诗 2000》中了。它们之间虽有不同，但我自己觉得还是同一阶段的东西。我以为只能从结果去看每个人所经历的创作阶段，它不是预先设计好的，难道我青春不再，就意味着“中年写作”的到来——这是很扯淡的。

问：是否在写诗的同时还写一些别的东西？写日记或笔记吗？

答：写随笔和小说，另有少量的诗论和译诗，不写日记或笔记。

问：如何看待创作中数量的问题？

答：要多写。但有个前提：得用脑子。有些人看起来很多产，但实际上只是对诗做出一种习惯性的反应，批量烧制出非常合乎标准的砖头来。这种写作是不担风险的写作，有一种安全感。这种工匠式的写作只是为了写得“像”，说俗点就是为了发表，这样的写作写得再多也等于零。与之相反的是一种更年期式的写作，多发生在自以为功成名就的诗人中间，一年写那么几首诗或一两首所谓“力作”，围绕这几首“力作”写下的创作谈式的随笔却很多，人的出场比诗要多，非常可怜。多写才能进入并保持一种状态：轻松、敏锐、不惜冒险。而那种因为写得少而高看自己的每首诗、以为自己写下的每个字都能传世的诗人，它们在诗中的表现必然会像一上场就哆嗦的中国男子足球队员。对创作中“数”的强调当然是为了“质”，关于这一点，我同意严力的一段表述，大意是：你一年写 100 首诗的话，可能只有 20 首能开出花来，另外 80 首就成了这 20 首的土壤。

问：如何看待创作中的语言（或口语）问题？

答：记得有人曾开玩笑说韩东最有名的一句“诗”是：诗到语言为止。应该说中国当代诗人们对语言的高度重视与韩东的这句话

有关，而孤立地看待语言蔚然成病的现状与对这句话的误读有关。当一帮手执长矛与语言作战的堂吉诃德在诗坛冲杀，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体。有人认为从韩东提出“语言”到王家新提出“词语”是一种进步，我的看法正好相反。“词语”是什么？“词”是什么？是“僧推月下门”还是“僧敲月下门”，这有什么关系？你当时是推了就是“推”，你当时是敲了就是“敲”，哪有什么优劣高下之分？把“语言”置换成“词语”，我们的诗人又回到桌边，不回到桌边他们不踏实。在远离语言发生的现场谈论语言，“词语”是最好的借口，说到“口语”，我一直感到悲哀，一个连这样普通的两个字都不敢正视的民族是怎样的民族？不敢正视“口语”就是不敢正视语言发生的原初状态，难怪别人会说：“这是一个嘴上说的和手上写的不一致的民族。”有些人那么反感“口语”，我想问问他们：非口语又是什么状态的语言？它是真实可靠的吗？

问：在诗坛自觉非自觉认同主流（或权力）话语的今天，请谈谈你对“边缘写作”这一处境的看法。

答：自觉非自觉地认同主流（或权力）话语又岂止是在今天，在诗坛？但我觉得有意思的恰是问题中提到的“边缘写作”在充当着今日诗坛的主流（或权力）话语。更可笑的是，它是凭借某人的尸体换得的，一个人死了，他所代表的一种滞后的诗歌一跃而成为诗坛主流，成为标准。可谓“一人升天，鸡犬得道”。在争夺主流（或权力）话语的斗争中，文化传统肯定是最终的赢家，它可以使政治显得急躁和气短。聪明的政治也终会利用它。曾记否？在1989后最初两年的诗坛上，“麦地”是所有诗人都要光顾的场所，不熟悉农作物和农具的名称便无以为诗。我总以为“边缘写作”的提法是说给外国人（在提出者眼里这是另一种权力的赋予者）听的，与“外省